

城市的承载能力、经济发展、环境因素等限制了一个城市的准入人口,因此地方保护往往是当地政府的行爲,并非高校所能左右。当地财政出钱的高校就要为当地人服务,就要多招收当地生源,其实是一种画地为牢的做法,并不能达到更好地为本地服务的效果。

# 高考招生:地方保护主义的是与非

■本报记者 温才妃

高考招生名额分配,从来就是一个敏感话题。日前,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编报2014年市属高等学校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通知》要求,2014年市属高校要结合首都实际,按照本市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要求,京外招生计划的安排稳中有降,同时调整京外各省区的计划安排,适度增加在中西部地区的招生计划。据悉,北京农学院已确定今年京外减招10人。北京各市属高校也已收到市教委下发的该校本科招生“建议人数”。多所高校招生部门负责人反映,“建议人数”所体现的招生趋势的确是“稳中有降”。

这项政策的出台,让部分想考取京校的外地学生、家长揪心,也引发了人们对招生中地方保护主义的猜想与批判。

## 市属高校减招何解

“大概5年前,4人间的宿舍通常有1至2名外地学生;如今,出现了一个宿舍安排4名北京学生住在一起的情况。”北京某市属大学辅导员王燕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通常学校会把不同地域的学生安排在一个宿舍,以便学生得到更多的文化交流,但因近些年外地生源招得少了,于是便出现了北京学生“包圆”的宿舍。

记者了解到,早在六七年前,北京生源持续减少,北京市教委曾一度鼓励市属高校扩大外地生源的招生比例,但随着北京市人口规模的变化,这一政策逐渐被废弃。

不可否认,招生看似大学里的“家务事”,但实际上与地方政府紧密相关。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教育科学学院首席专家劳凯声告诉记者,有很多影响“调剂性招收”的因素,譬如城市的承载能力、经济发展、环境因素等限制了一个城市的准入人口,因此地方保护往往是当地政府的行爲,并非高校所能左右。

加之,市属高校由当地政府拨款,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多招收本地生源似乎“合情合理”。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招生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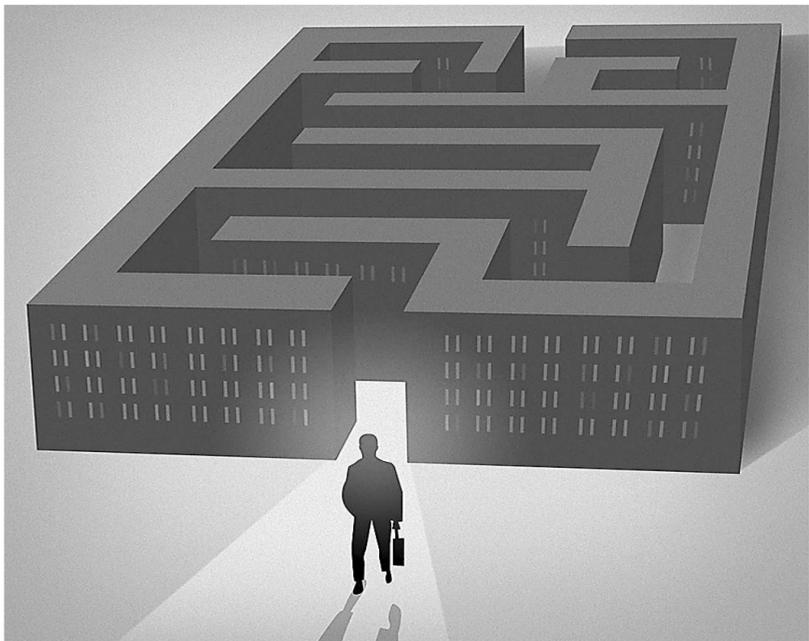
据劳凯声介绍,北京市属高校除了招收本地考生外,也会招收一定比例的外地生源,招收外地生源属于“调剂性招收”。比方,北京在某省属高校招收一定比例的考生,反过来某省属高校也会在北京招收相应比例的考生,通过互换的手段实现高校生源多元化。

“但此次北京市教委政策的出台更多地表现出单向性,只强调了收紧的一面,并没有强调沟通交流的一面。”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说。

在他看来,尽管政策旨在通过减少外地生源进京达到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但大学生进京只是临时性地接受一段时间的教育,并不能与日后留京画等号。“该政策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教育上的地方本位主义,可能不仅达不到控制人口的目的,反而还会助长北京市高校生源本地化的趋势。”

## “度”在哪里

就在北京市教委发布通知几日后,上海市



京外减招政策的出台让部分学生、家长揪心,也引发了人们对招生中地方保护主义的猜想与批判。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教委也发布了一项与招生报考相关的通知。为了鼓励上海市考生积极报考外省市高校,上海市教委宣布将实行6项优惠政策。其中,考生报考外省市高校最多可获20分加分投档,自愿填报外地高校并被录取的考生可获一次性补贴1000元。

同是汇集了优秀教育资源、人口即将达到上限的超级城市,北京与上海一堵一疏的作为,使得人们不禁要问,市属院校招收本地生源与外地生源的比例,究竟该如何把握“度”的问题?

劳凯声认为,大学招生本身并没有“度”的要求,大学的目的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只要能录取优秀生源,大学本身是可以不问户籍所在地的。别敦荣则认为,所谓的“度”并没有恒定的比例,而在于北京、上海等地高校与外地高校的融合程度。

他解释说,人们一般的理解是,当地财政出钱的高校就要为当地人服务,就要多招收当地生源,其实是一种画地为牢的做法,并不能达到更好地为本地服务的效果。照此进行,北京生源本地化后,将可能使北京青年因较少接触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带来的地区文化,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群体——缺乏全国意识,无法起到领导和服务全国的作用。

当然,北京高校也可以选择向国际开放,“但向本国的外地开放尚且无法做到,又谈何向国际开放的心胸与气魄?”在这一点上,别敦荣认为,北京市属高校应当有气魄向全国开放,而非仅仅为

北京服务。在他看来,上海的做法值得鼓励,把上海生源推向全国各地接受教育,他们学成归来后回到上海,可能更好地理解全国各地文化,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上海。

但他同时提醒,吸引上海生源“走出去”应该拿出更有效的措施,例如,对于绝大多数上海家庭而言,500~1000元的奖金显然达不到鼓励学生出沪的目的,如果能以学费或资助全部学费的形式鼓励上海学子到外地求学,效果可能会更好。甚至可以采取上海高校与外地高校合作办学的形式,既鼓励学生去外地就读,又允许他们在读期间回上海高校接受一两年教育,进而推动上海市高校与全国高校的融合。

## 部属院校招生地方化原因复杂

实际上,相比较市属院校陷入的地方保护主义之争,部属院校的地方保护主义为更多人所诟病。

北大被人戏称“北京大学”,复旦被人戏称“上海复旦大学”“阿拉复旦”……部分教育部属院校招生地方化时至今日仍高达30%~50%。几乎每年两会都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指出,招生名额上的地域歧视、分配不公平等问题。

劳凯声表示,部属院校地方保护主义是导致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属院校的经营来

源、办学目的等等,从设立之初就是为了解决全国高等教育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某一个地区培养人才而服务。本地生源过多,不但与部属院校的办学功能相违背,而且在办学公平问题上,对老百姓无法交代。

然而,部属院校招生地方化却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前些年,一些部属院校下放地方,采取教育部与地方共建的模式。所谓共建,就是由教育部、当地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劳凯声指出,地方政府出资后想要分一杯羹,最直接的举动就是为当地争取更多的生源,“之所以要更多生源也是基于就业、发展等因素考虑的,是利益上的博弈与制衡,而这些并非大学所能左右”。

随着现代教育发展,即便是非共建的部属院校,也不能回避为地方服务的责任。

别敦荣告诉记者,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强调部属院校为地方服务,首当其冲的就是多招收当地生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明它为地方服务的立场。因此,部属院校在为地方服务和为国家培养英才两个目的上,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矛盾。

此外,一些部属高校还由于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不能摆脱多招本地生源的困境。如某部属院校合并了多所省属院校,由于原来的省属院校本地生源占多数,因此其招生政策必须保证相当比例的本地生源。

正是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使得部属院校被冠以“XX人大学”“XX地大学”的戏谑之称。

## 取决于顶层设计

同样棘手的还有破解部属院校招生地方化的对策。专家们表示,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尚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法。

但国外的一些做法,或许能给国内高校以启发。据别敦荣介绍,美国有一类院校,名为“national”,其实并非国立的意思,但该类院校不问学生的出生地,只考虑学生的能力、水平、成绩和求学意愿,择优录取;而另一类名为“regional”,即地方院校,往往由政府出资,在定位上保证了招收相当比例的本地生源。“美国对院校进行分类的做法,对内外部院校怎么做到‘national’,而不是被‘regional’,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劳凯声则表示,尽管当前大学无法摆脱计划招生的束缚,但是可以尽量缩小制约的因素,发挥大学的功能。比方说,拥有自主招生权的部属大学,在招生录取中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考生,对考生做更多的比较后择优录取等等,从而逐步消除大学之外的限制因素。

但他还强调,现阶段要解决招生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更多地还是取决于政府,而不是大学。“政府在招生录取中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考生,对考生做更多的比较后择优录取等等,从而逐步消除大学之外的限制因素。”

“当一个城市人口达到极限,是否非得控制大学招生?能否不动大学招生,而动其他方面?控制大学招生之后,是否会违反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控制人口是一个综合问题,在我看来,以上问题都值得商榷。”劳凯声说。

# 西电留学生培养的“文化牌”

■本报通讯员 高巍巍 记者 张行勇

“在西电学习了三年,回过头来看,最不舍的还是这里的老师和一直影响我去努力的浓浓的团队文化氛围。”

近日,苏雷曼(Souleymane Balla-Arabé)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谈起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留学生活,一脸兴奋的他感触良多。苏雷曼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简称“西电”)招收的首名全英文授课留学博士生。

从实施双优战略扩大办学规模,到探索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再到提高留学生培养质量,近年来,西电国际教育学院一直注重发挥苏雷曼口中的“文化”牵引作用,相继打出了一副卓有成效的“文化牌”。

西电国际教育学院近年来以“彰显特色、扩大规模、规范管理、打造品牌”为指导方针,在不断扩大留学生规模的基础上,逐渐提升培养层次,吸引了一大批外国留学生来西电攻读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2013年,西电各类来华留学生突破500人;其中,学历生177名,预科及语言生60名,学历生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74.7%。

## 助力提高留学生培养质量

在接受采访时,苏雷曼对自己的导师、校长助理高新波教授教给他的一句话——“如果想在学术上走得快,就一个人单飞;如果想走得远,就得融进一个团队”印象很深。

苏雷曼在博士期间发表了11篇论文,获得了联合国专项奖学金。他对自己能够以这样的成绩完成学业感到既兴奋又惊讶。“我的导师就像父亲和朋友一样关心和鼓励我,也非常注重对我的团队精神的培养。在我们的团队里,大家就跟兄弟一

样。”他说。

高新波说:“当留学生招生规模上升到一定层次,面对可能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更多地从推进文化理解和融合的角度开展工作,帮助他们融入团队,这样也有利于促进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之间的互相尊重、平等对话和思想碰撞,同时有益于加快学校整体的国际化办学的步伐。”

为了让留学生更快地适应在西电的学习生活,融入团队,西电国际教育学院不仅在留学生专业学习和科研指导方面注重团队精神培养,在实际生活中,学院也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们快速融入新集体。

“老师对我们的关怀很细致,现在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撒布琳娜说。

撒布琳娜是2013年新入学的尼泊尔籍学生。刚进校时,她对周围的一切都不适应。为了帮助她尽快适应新环境,摆脱孤独感,负责他们年级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教师席红梅,每天一大早就带着他们打太极拳,隔三差五地带他们包饺子、做中国菜,不定期地带他们到兄弟学校参加联谊活动。

## 推动留学生趋同化管理

自认为最差的,来自美国的语言生弗雷德,在老师们不厌其烦的指导下,渐渐喜欢上了西电的一切,与老师成了好朋友。

来自也门的本科三年级留学生萨米回想起前不久举行的“留学生文化节”上,对自己身着民族服装的精彩表现还是兴奋不已。“来这里学习三年,‘文化长廊’‘留学生文化之夜’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学校给我们创造了很多交流的机会。”萨米说,这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

机会,同时也增进了他们和中国同学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实现留学生的趋同化管理是当前国内高校在留学生培养方面面临的共性问题。我们目前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围绕这一目标推进,这也有助于推动留学生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有助于扩大西电学生的国际化视野。”西电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李晖说。

西电国际教育学院负责留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教师张乐平介绍,学院每个月都会制定留学生心理辅导计划,几乎每天都要与他们谈心交流,并定期对校外住宿留学生进行家访。与此同时,学院还会专门把这些交谈的过程通过影像的形式保存下来,以便于为留学生们建立成长记录。

“留学生来到西电求学,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文化休克’问题,通过与他们反复深入的交流,举办各种各样的人文活动,让他们真正觉得西电就是他们的家,对于帮助他们解决这样的问题,增强文化认同感,尽早融入到西电的生活中,会有一定帮助。”张乐平说。

据了解,国际教育学院还专门面向留学生开设了中国文化系列课程,向留学生讲授中国书法、武术、民族音乐、剪纸等知识,积极组织他们参加相关专题讲座、学术论坛,并定期开展汉语朗诵比赛、作文比赛、留学生汉语学习成果展等活动。

## 协同文化促进培养模式创新

西电国际教育学院不仅在留学生教育和管理过程中注重文化氛围的培育,在与行业优势企业合作开展留学生培养的过程中,也牢牢把握协同

文化作用的发挥。

据李晖介绍,学校坚持实施“双优”战略,利用电子信息学科的优劣势,结合电子信息行业的优势企业,通过与这些企业合作扩大留学生的招生规模,改革来华留学生的培养模式。目前,学校已与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中兴通讯等IT行业优势企业签订了来华留学生联合培养协议,建立了“西电—中电联合培养基地”、“西电—中兴留学生联合培养基地”,并先后成功举办五期电子信息领域海外高级研修班。同时吸引合作企业设立企业奖学金,用于150多名多语种专业类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和进修生培养和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建设。在校企协同合作的过程中,学校会根据企业的反馈,及时调整和丰富课程体系,同时由企业和学校导师联合设计题目,指导完成实习过程。

此外,学校还积极推动院校协同,共建全英文授课品牌课程共享平台。目前已联合校出版社、AT0086在华网,启动了数字信号处理、模拟电子线路等10门理论课程以及通信系统实验、控制系统实验等2门实践课程的全英文教材建设和一体化全英文授课品牌课程教学资源平台的建设。

高新波认为,“双优”战略的实施,本身就是协同文化的生动体现,要将行业内的优势企业和学校的优势学科有效结合,发挥出“1+1大于2”的作用,不仅需要校企双方增进理解,更需要这种协同文化来指导和引领。

“与综合性高校相比,像我们西电这样的行业特色型高校在推进国际化办学方面,如何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找准行业需求和兴奋点,寻求灵活的、深层次的合作,打好符合自身特点的‘文化牌’很关键。”高新波说。

## 中国大学评论

据说北京大学内部有个调侃的说法,大意是“北大无小事”。果真,继十年前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卖猪肉以后,如今北大法学院法学专业的硕士生在京城市开店卖牛肉粉又成了新闻。(参见科学网4月13日转载的《长沙晚报》有关报道)本来卖猪肉和卖牛肉粉都属于个人行为或个人选择,这种事情只有新闻价值,与大学教育的关系不大,但网友的不同反应也关涉到当下大学遇到的诸如培养目标转型一类的困境,故有必要以“卓越”这个关键词为例来稍加辨析。

“追求卓越”是大学的目标和口号。中国大学初创之时,就是以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为主的。譬如北大哲学系上世纪30年代的“本系通则”便说:“本系功课,前两年偏重教学讲授,学者听取;后两年偏重教育者指导,学者研求。”这种学术分科,注重专业和研究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由此看来,大学所谓的追求卓越,主要指专业之内的卓越,也就是说,它主要是以专业评判为标。以专业标准来衡量,法学专业硕士卖牛肉粉当然是不合适的,这也是反对者的依据之一。反对者的另一个依据也与此相关。自大学经历了“洪堡模式”后,即是以专业化为基础,即便是斯坦福式的社会“服务器”,也是以专业服务为基础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专业化就没有大学。例外的实例当然有,比如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但你不可能因为比尔·盖茨辍学创业成功,就把所有的学生想象成盖茨,由此证明大学专业化的不可取。

问题是,在当下中国,大学里提倡卓越的人所讲的“卓越”与受教育者想象中的“卓越”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一些人看来,北大法学硕士卖牛肉粉无关“卓越”时,另一些人却认为这同样是在追求“卓越”。

“卓越”理解上的歧义缘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学走向“大众化”,改变了原有的取向和格调,其重要特征就是世俗化,即走出象牙塔,贴近现实,更多地服务于社会。

但现在看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完全是行政主导的行为,学校自身并没有作好准备。面临重大的转型,大学完全是在被动地适应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结果,社会和市场的价值取向替代了原有的专业化的标准。不仅调侃“学霸”成为社会和校园中的时尚,而且社会的标准(如官职大小)以及市场的标准(如收入多少)渐渐成了衡量学生追求“卓越”的效果或“成功”与否的新标准。

专业化标准与社会标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专业内的成绩,后者则超越了专业。在专业之内,不可能认为一个专业常常挂科的学生是“卓越”的,但专业之外的社会标准,却往往基于“行行出状元”的多元评判。于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一个专业里迷失并不意味着在其他行业里作不出成绩,所以在大学中挂科的学生,也常常因为所谓点子多或者能赚钱而受到同学的追捧。而以社会标准看,“行行出状元”本身也具备道德上的优势。因为它消除了职业歧视,体现出职业平等。从这个角度看,一名法学专业的硕士生放弃专业,或从事与法律专业无关职业有其合理性,并且也符合雅斯贝尔斯“大学提供的各专教育仅仅是将来生活的一个基础”的论断。但从四年本科、三年硕士的专业学习当成一种尝试和一次人生的经历也未尝不可。经过尝试觉得自己并不适合从事与法律专业相关的工作,他当然可以选择自己的路。

可是,当类似的个人选择变得合理,效仿者越来越多以后,大学就成为个人职业选择的试验场,大学原有的文明传统、知识生产和文化创造原有的角色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具体到每个研究生导师,当我们尽力培养学生专业性的研究态度,教会他们研究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后,他们却选择了逃离专业,这时候是坚持不变,还是适时地进行改变呢?

虽然这位选择卖牛肉粉的北大学生说,他是在按照法律背后的精神和思维来经营生意的。笔者也相信他确实要比一般没读过多少书的小本经营者更具眼光,但开店卖牛肉粉毕竟与法学专业无关。

北大法学院2011年印行的宣传册上有关“培养目标”的部分说:“北京大学法学院拥有全国最优秀的生源,以‘承担历史使命,关心中国问题,素质学术并重,全面培养人才’为育人培养理念,强化素质教育,鼓励创新意识,关注技能培养,培育国际视野,成为明德、知法、维新、求善的新型法律人才。”

看来,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最需要调整的是学校的培养目标、教育方式和课程设置。

『卓越』的歧义与大学培养目标的更新

尤小立